



越文化研究丛书

王建华 主编

胡愈之评传

朱文斌 著

科学出版社

越文化研究丛书 王建华 主编

胡愈之评传

朱文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愈之评传 / 朱文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3722 - 2

I. ①胡… II. ①朱… III. ①胡愈之(1896—1986) - 评传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5893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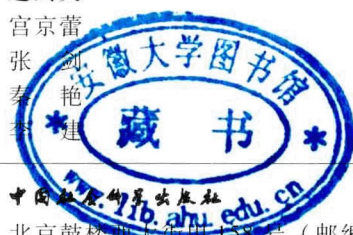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张 剑

责任校对 秦 艳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5

插 页 2

字 数 339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越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学勤 陈伯海 陈桥驿 高丙中
董乃斌 董楚平 葛剑雄

主 编 王建华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建华 叶 岗 朱志勇 寿永明
李生校 张炎兴 周一农 费君清
高利华 梁 涌 陶 侃 章 融
谢一彪 潘承玉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度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
《越中知名现代作家系列研究》(课题编号09JDYW01ZD)成果丛书

课题负责人(主编)

王建华 刘家思

课题组主要成员(副主编)

朱文斌 李先国 吕晓英 陈改玲 周桂华
钟小安 范志强 黄 健 傅红英

《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丛书》

序

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丛书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9 年度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课题编号 09JDYW01ZD）成果。

世纪之交，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了浙江省不仅要建成经济强省，而且要建设成文化大省的重要决策，大大地推进了浙江文化的研究，也激活和浓化了浙江的学术空气。社会发展必然推动文化的进步，但文化的精进反过来又会推动社会的发展。这种相辅相成的关联性，自然要求浙江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获得全面进步后尤其要重视文化建设。多年来，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浙江省文化建设的一个亮点，不仅是浙江省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而且也是浙江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然而，文化研究有一个基本的抓手，就是作为社会主体和文化主体的人。因为人既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又是社会、文化的载体，文化演进和社会发展都是由人主导的。因此，研究文化就是要研究主体的人所创造和彰显的社会文化的历史形态和内在品格，为今后社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服务。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申报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科规划重大课题《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2009 年获得了立项资助。

从全省范围讲，浙江（越）文化研究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萌芽，到 20 世纪末期揭幕，至今已经着手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浙江（越）文化的史论研究；二是浙江（越）文化名人传记的研究、撰写。前者以宏观的理论探讨见长，奠定了浙江（越）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后者从文化主体的个体出发进行微观的透视，呈现浙江（越）文化的主体状



态。这两种视角构建了浙江（越）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浙江（越）文化研究的基础。

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基地前几年组织力量重点研究了“越文化通论”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推出了一批成果，就是立足于史论，旨在为今后的越文化研究奠定基础的。然而，越文化研究停留在这里是不够的。一是我们的研究必须从历史走向现代，要服务于当代，启示将来，因此开展现代越文化研究显得十分重要；二是文化不只是抽象的、概括的、普遍意义的，也是具体的、鲜活的、个性化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一方面要将理论的概括融入到鲜活的个体和具体的形态中去，另一方面又要从个体中把握其普遍的意蕴指向，同时还必须把握古往今来历史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与超越的情形。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内在特征与基本面貌。一种先进的文化姿态总是既不会忘却历史，又能着眼于现实，放眼于未来；而一种有生机和活力的文化，则不是着眼于传统，而是立足于现代。从本质上说，文化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从历史中把握内在精神的现代基质，探寻现实人生与社会文化发展的路向。所以，文化研究必须具有三种眼光：过去—现在—将来；必须抓住三个基点：人—时代特征—自然环境；必须把握三种内涵：传统—现代—未来。而一种文化如何从传统走向未来，现代的情形则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把握现代的蜕变，是推进文化研究由注重历史走向着眼未来的一条必由之路。

越中自古以来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名人辈出。在近代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越中诞生了蔡东藩（1877—1945）、刘大白（1880—1932）、鲁迅（1881—1936）、许寿裳（1883—1948）、周作人（1885—1867）、夏丏尊（1886—1946）、孙伏园（1894—1966）、胡愈之（1896—1986）、许钦文（1897—1984）、谷剑尘（1897—1976）、孙福熙（1898—1962）、章锡琛（1889—1969）、魏金枝（1900—1972）、孙大雨（1905—1997）、姚蓬子（1905—1969）、孙席珍（1906—1984）、吴似鸿（1907—1988）、陶亢德（1908—1983）、柯灵（1909—2000）、徐懋庸（1910—1977）、陈梦家（1911—1966）、金近（1915—1989）、谷斯范（1916—1999）等一大批著名作家。他们有的是现代文学大师，有的是五四白话新诗文的开创者和代表诗人，有的是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有的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有的是上海“孤岛”时期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有的是白马湖派



的代表人物，有的是湖畔诗社的重要诗人，有的是著名的戏剧家，有的是“左翼”文学的著名作家，有的是鲁迅杂文的继承人，有的是抗战文学的代表作家，有的是近现代通俗演义小说重要的开创者……他们贯注着越文化的血脉，又创造了鲜活的现代越文化成果，显现了越文化的现代形态与内在特征，是越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的活的文化标本，反映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越地人民的精神历程及其所取得的历史文化成就。

因为以往的研究关注历史的比较多，而关注现代和当代的比较少；关注文化精英和高层的较多，关注大众形态和普通性的很少，所以，除鲁迅和周作人之外，学术界对上述越中作家重视不够，大都没有被纳入学术界系统研究的视野之中。而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发掘其精神资源，关注其现代文化成就的尤其少，审视其创造的独特文化形态，显得非常不够。特别是对于他们在浙江（越）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由封建走向民主的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精神流变和思想引领的生动状态更疏于探究。因此，开展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是对浙江（越）文化研究的一种补充、深化和拓展，意义重大。一、展示浙江文化的现代成就，展现浙江文化的先进性，弘扬浙江文化的现代精神，为正确认识从晚清到现代浙江（越）文化的历史特征提供一个切入口，为浙江（越）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些思想启示；二、开拓浙江（越）文化的研究领域，有利于建构历史形态研究—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研究—现代越文化研究的完整研究体系，推动浙江（越）文化的全面研究，推进浙江省文化工程的研究进程，为区域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途径；三、为正确认识近代知识分子如何转变为现代文化精英提供一种理论指导，为现代史书写提供参考；四、填补上述作家没有整体研究的空白，深化和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为文学欣赏提供指导和启示；五、为人物研究和评传写作提供一种学术借鉴与参照；六、镜照世俗社会，启示现实人生，引导个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社会进步。

因此，我们准备分期分批地对上述知名作家展开研究。最初的设想是于2005年提出的，2007年着手准备，2008年开始启动，2009年开始了全面的实质性研究，到现在已经有几年了。目前选取了学术界关注比较少，整体研究比较薄弱，甚至是还没有作过整体研究的10位作家



作为第一批研究对象，组成了《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重大课题。这些作家是蔡东藩、刘大白、许寿裳、夏丐尊、孙伏园、胡愈之、魏金枝、孙大雨、徐懋庸、陈梦家。我们从校内外选取了有一定研究基础和实力的教师作为课题组成员，采取统一规划、目标一致、分项包干、责任自负的方式，展开研究。我们的想法是，这一批作家研究完成后，重新申报项目对第二批、第三批作家进行研究。至于为何没有将鲁迅、周作人两位大师列入第一批研究对象，是因为学术界对他们已经有很充分的研究，各种研究成果很多，就是从浙江（越）文化视角去研究他们的成果也不少，这是我们要特别说明的。

我们试图通过对这些越中现代著名作家的研究，发掘浙江（越）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是如何将时代要求内化为文化精进者的主体追求，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的深层原因，从而把握浙江（越）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的精神脉络，探求浙江（越）文化的现代精神底蕴，构建越地现代人类学的理想图景。其特点在于：一、着眼于从近代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抓住人这个主体，以系列研究来审视浙江（越）文化从封建传统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的演变轨迹，打破以往研究中宏观宽泛的研究态势，改变割裂式的个别研究，既呈现浙江（越）文化的个体活性，又彰显浙江（越）文化的历史形态，避免以偏赅全、人为设定的局限与不足。二、文化既是一种历史形态，又是一种现实形态，还是一种从历史到现实的过渡形态，但文化研究始终是为现实形态的建构服务的，要着眼于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打破庸俗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惯性思维模式，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运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从社会转型的动态文化大背景中去进行整体研究，揭示社会的剧变对个体人生的影响，通过全面把握社会转型中不同个体的生命旅程、思想性格、人生业绩和创作成就，来把握浙江（越）文化的现代形态，改变以往以静态的文本解读和阐释的简单化方式，凸显文化的立体感和整体性。三、文学是文化的一种主要构成要素，文化灌注在文学之中。因此，从各个研究对象的生命发展历程中来把握他们的文学创作，审视它们在现代浙江（越）文化建构中应有的文化、艺术和思想价值，把握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意义，彰显浙江（越）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力，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在这里，个体与



整体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联系，就成了我们研究过程中的重要原则，并重视将这些作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场域中展开研究。

在研究中，我们强调融社会批评与主体剖析于一体，理清各个研究对象的生命旅程和思想发展脉络，突出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将事业（仕途）、爱情和交游三线交织，全面地展现其悲喜沉浮的人生，揭示其人生和创作取向的主客体成因，立体地展现其真实形象，彰显其现代的精神特征和越文化的现代品格。同时，我们又注重分析和把握他们文学创作的特色和成就，认识他们各自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们的研究，既注重文化个体活性，又注重理论概括；既注重历史传统的把握，又注重对传统与现代的融通、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并以社会学、文化哲学和生命哲学为指导，突出原初性研究特征，挖掘越文化渊源；且以文本研读、田野调查和人物访谈为路径，立足于社会转型的背景来审视他们的人生历程、思想情感和文化心理，透视其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观以及价值追求，进而彰显浙江（越）文化的现代精神。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注重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研究，力求比较全面而准确地对研究对象的创作成就及其文学地位予以比较客观的评价；注重对现有研究文献和传记资料的甄别与辨正，剔除以往研究中的错漏与偏失，力求还研究对象以本来面目；注重从特定时空背景中去审视研究对象主体人生的独特状态，力求对其人生和思想历程作出比较科学而合理的阐释。因此，我们一方面高度重视搜集越文化背景和历史资料，以及各研究对象散落的文学作品、文献资料 and 生平事迹，把准其精血气；另一方面又重视对研究对象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的考察，重视访问其后人及其友人的后代，重视与相关的研究专家交流，以完善研究工作。

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再三讨论了各子课题的研究方案，又审定了各专著写作纲要，有的经过了几次的讨论修改以使整个课题的研究成果保持面貌的基本一致，而又各具个性和特色。在这套成果丛书出版之前，我们也随机性地选择部分书稿予以审阅，每部书稿都经过了三四次的修改。然而，由于研究对象几乎都是博古通今、中西交融的鲜活的文化个体，牵涉的学科领域很广，触及社会与人生的问题很深，文化内涵很丰富，对研究者的素养形成了很大的挑战，赋予了研究工作本身较大



的难度；加上课题组成员都担负着繁重的教学工作，有的还担负着繁重的管理工作，精力不够集中，时间比较紧张；尤其是我们水平有限，并且对人物评传的撰写缺乏经验，因此，研究工作难免存在着一些粗疏和不足，我们敬祈读者批评指正。同时，由于课题组成员从事研究的经验和实力本身存在差异，因此，虽然我们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大都十分认真和负责，但实际上这套丛书的质量很难做到整齐划一，这是我们尤其感到不安并要恳请读者谅解的。我们必须告白的是，我们所做的仅仅是抛砖引玉的工作。

在研究进入尾声，成果即将付梓之际，作为课题主持人，我们首先要感谢全体课题组成员几年来的密切协作与艰苦工作，使本课题的研究工作得以按时完成。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领导部门以及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基地的大力支持。因为有了这些支持，我们这个课题的研究才由设想变为了现实，这套成果丛书才得以顺利出版。而且我们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宫京蕾编辑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此外，对一直以来给我们的研究工作以热情帮助和关心的许许多多好心人，我们一并致以谢意。

课题负责人：王建华 刘家思

序 言

胆剑精神的传人

古越大地，稽山鉴水，群星荟萃，名人辈出。毛泽东曾诗云：“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的胡愈之也诞生在这里，成为越地的当代文化名人。

胡愈之 1896 年 9 月 9 日出生于浙东上虞古县城丰惠镇，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一直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主要撰写时事评论与译介外国文艺作品，担任期刊的主编和报纸的主笔。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代主席等职。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著名社会政治活动家、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胡愈之不但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文字改革和人民外交事业以及普及教育等方面也建立了卓越功勋，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为一身，被称为文化战线上的“少有的全才”、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余太君”。胡愈之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追根溯源与他从小接受故乡越文化的影响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是文化的产物。每个人一出生就处于一定的文化环境当中，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本土文化的影响。本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人的成长和社会化过程就是不断接受本土文化影响、由生物人向文化人转变的过程。一个人小到饮食起居、待人接物，大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一不是本土文化影响的结果。胡愈之生于越地、长于越地，当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土越文化的影响，



成为越文化的嫡系传人。

越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支，诞生于以绍兴为中心的越地区域，其源头至少可追溯到七千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在历史长河里，越文化几经变迁，不断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与其他地域文化如吴文化、楚文化、徽文化、齐文化、鲁文化等杂糅并处，相互融合，但特色也渐趋鲜明，逐渐形成自己所独有的特征。越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无疑是“胆剑精神”。公元前494年，吴越两国交战，越国战败后屈辱求和，越王勾践夫妇入吴国（现今的苏州一带）当了奴隶。忍辱负重三年，勾践才得以返国，立志报仇雪耻。《吴越春秋·卷八》中记载，越王勾践“苦身劳心，夜以继日，目卧则政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中夜潜泣，泣而复啸”^①。这就是著名的“卧薪尝胆”的故事。与“卧薪尝胆”紧密相连，并成就勾践灭吴称霸大业的，还有著名的“越王剑”。“昔者，越王勾践有宝剑五，闻于天下”^②，相传均为当时越地著名铸剑高手欧冶子夫妇所铸，他们铸造的宝剑“其华淬如芙蓉始出，观其钺，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③，宝剑锋利异常，可以风吹断发，削铁如泥。所以，《庄子·刻意》中说：“夫有于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④在当时，作为绝对珍品的越王青铜剑，既是冶金工艺的代表，更是越国开疆拓土的实力之象征。

“卧薪尝胆”的“胆”与越王的“剑”，共同构成了家喻户晓的“胆剑”故事。勾践以“卧薪尝胆”和“十年磨一剑”的胆剑精神，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发愤图强，励精图治，终于实现了兴越、灭吴、称霸的伟业。胆剑精神中的“胆”，可引申为艰苦创业、励精图治的胆识，反映出越地人聪慧善谋的“柔性”；“剑”可引申为披荆斩棘、战无不胜的勇气，蕴含着越地人强悍豪爽的“刚性”。南宋状元王

① 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3页。

② （东汉）袁康、吴平辑录，俞纪东译注：《越绝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③ 同上书，第220页。

④ 杨柳桥：《庄子译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十朋曾将越地人文精神概括为“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①。这是对胆剑精神所蕴含的越地人双重性格特征的最好注释，越地人既有刚强硬气、不屈不挠、“三千越甲可吞吴”的英雄气概，也有韬光养晦、能屈能伸、等待“东山再起”的雄心壮志。其中，还蕴含着创新意识和务实实干精神。胆剑精神是根植于民众的群体精神，融合了集体智慧，体现出越地人特有的刚柔相济的“韧性”特征。

当然，胆剑精神深入越地民间，并不是说勾践时代才产生，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史前。远古时期的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察六廋，脉地理，劳身焦思，手足胼胝，决不墨守成规，大胆创新治水方略，吸取其父鲧治水的教训，改堵为疏，终成治水大业，不也正是胆剑精神的生动体现吗？所以，作为越文化核心特征的胆剑精神由来已久，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越地人；反过来，一代又一代越地人又通过自己的行为深刻地彰显了越文化的“胆剑”特征，正如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所说：“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所共有。各个民族的人民都遵照这些文化目的，一步步强化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内驱力的紧迫程度，各种异质的行为也相应地愈来愈取得了融贯统一的形态。一组最混乱的结合在一起的行为，由于被吸收到一种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会通过不可思议的形态转变，体现该文化独特目标的特征。”^② 确实，长期生活在越地的人们，在越文化的濡染下，文化目标逐渐趋同并显示了其独特性。所以，从古代独标高格精神的嵇康、王充、陆游、王思任、徐渭、朱舜水、王阳明到近代奋身于民族革命斗争的秋瑾、徐锡麟、蔡元培、鲁迅等越地文化名人身上，我们都可看到那种坚韧不拔、励志图强、理性务实、敢于创新的“胆剑精神”和“韧性”特征。同样，生于越地且受越地先贤影响的胡愈之自然也不例外，他的一生，正是“胆剑精神”的真实写照。

第一，逆境奋起，励志图强。身处逆境不气馁，反而发愤图强是越

① 参见（清）悔堂老人《越中杂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②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文化胆剑精神的核心体现，在胡愈之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胡愈之从小体弱多病，并遭遇家道中落，逆境中的他并没有因此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在求学屡受挫折、无法继续学业时，他就坚持自学提高，并通过函授学习了世界语。18岁时，胡愈之以练习生的身份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在那个文化名人汇集、充满竞争的地方，要想立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胡愈之就抓紧一切时间勤奋学习，尽力丰富知识储备，努力开阔视野，奋发图强。商务编译所每天工作时间为6小时，6小时以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胡愈之几乎都用在读书上，总是来去匆匆，舍不得浪费时间。作为商务同事的茅盾曾经这样描述：“上班下班的时候，从工厂大门到涵芬楼（编译所即在涵芬楼的二层）那一条铺着轻便铁轨的路上，我时常看见这么一个人：身材矮小，头特别大，脸长额阔，衣服朴素，空手的时候很少，总拿着什么外国书报，低头急走，不大跟别人招呼。”^①这就是胡愈之刻苦攻读的模样，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并不气馁，更不自卑，而是通过挤时间自学将自己变成一个知识渊博、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文笔犀利的先进知识分子。正是这种努力，使他当时作为一名练习生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这在当时商务编译所是绝无仅有的。

1928年，胡愈之被迫流亡法国，又一次陷入逆境之中。初到法国，胡愈之不懂法语又没有熟人，生活异常艰难，但他凭借精通世界语的优势，与法国世界语团体取得了联系，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很快解决了生活和学习问题。他不但进入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还利用懂英语又懂世界语的优势，加紧学习法语，很快就掌握了法语的基本知识。期间，他抽出时间为《东方杂志》写了许多谈欧洲各国，特别是西欧国家时事问题的通讯、评论文章，一方面为了赚取留学生活费，另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给国内的读者开拓眼界、增加对世界形势的了解。从1928年到1931年三年间，胡愈之在《东方杂志》发表的评论文章达17万多字，平均每月近5000字，这在当时中国报社专职驻外记者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① 茅盾：《悼念胡愈之兄》，《胡愈之印象记》（增补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74页。



1942年2月，日军攻陷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工作的胡愈之被迫逃亡到印尼，钻森林下乡村，不断迁徙，生存都成了问题，但他同样泰然处之，和朋友们积极想办法渡过难关，大家一起通过办酒厂和制造肥皂等，解决了生活问题。待众人的生计问题得到了缓解之后，胡愈之又组织沈兹九、汪金丁、邵宗汉、王任叔、张企程、张楚琨、高云览等成立“同仁社”。“同仁社”成员每星期聚谈一次，并把讨论交流的思想心得整理出来复写成小册子，送给隐蔽在其他地方的社员传阅，帮大家认清当前形势，坚定抗日信心。

这就是胡愈之面对逆境的态度，从不屈服妥协，反而迎难而上，励志图强，适时奋进，彰显了“卧薪尝胆”、艰苦奋斗的精神。

第二，坚忍不拔，敢作敢为。越文化胆剑精神既有韧性特质，又有担当意识，体现在胡愈之身上就表现为坚忍不拔、敢作敢为的精神特征。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胡愈之悲愤异常，和商务工人一起走上街头，参加罢工游行，并与郑振铎、茅盾、叶圣陶等人一起创办了《公理日报》，积极刊登关于五卅运动的真实信息，还在创刊号上提出了六项解决五卅事件的要求，对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暴行进行声讨。另外，胡愈之还利用手中如椽之笔，真实而全面地记录下五卅惨案的整个过程，那就是著名的长达3万字的《五卅事件纪实》这篇文章，向国内外揭露了帝国主义压迫的本质，为争取民族独立运动起到了舆论推动作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亲眼目睹反动政府的杀戮和残暴，震惊、悲伤的胡愈之本着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勇敢地写下一封致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三大知识分子”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的“四一二”抗议信，大义凛然、锋芒毕露地痛批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暴行，如此骨气和胆量，是当时一般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勾结租界巡捕房，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七位救国会领导，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胡愈之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奔波，担负起声援营救的组织工作。为了援救“七君子”，胡愈之还约请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起“救国人狱运动”，迫使国民党当局不敢对“七君子”判罪，最后不得不交保释放。胡愈之在这场运动中，以其敢作敢为的勇气和不凡的斗争



智慧立下了卓越的功绩。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胡愈之冒着敌人的炮火，奋不顾身地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以其无畏的精神构筑抗日救国的文化阵地，既与邹韬奋一起创办《抗战》三日刊，又具体参与了国共合作的机关报——《救亡日报》的领导与编辑工作，并写了一系列如《和平不可分论》、《抗战时期的外交问题》、《谨防“疫病”》等文章，分析时局，指明方向，对妥协投降的言行进行批判，表明中国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胡愈之被戴上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斗争，一度被剥夺了行动的自由。更为可恨的是，各种“战斗队”和“专案组”要求他交代罪行的同时，还让他写旁证材料，去诬陷指证别人。胡愈之并没有屈服，即使写旁证材料，他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畏强权和威胁，不考虑自身的利益，为很多人澄清了被横加的“问题”，无形中保护了不少好同志。1976年1月，冯雪峰被“四人帮”折磨而病死，当时“四人帮”不允许开追悼会，也不允许称冯雪峰为同志，胡愈之听到后极为气愤，到处奔走呼吁，终于在告别仪式上为冯雪峰争得了“同志”的称呼。

胡愈之就是这样，在任何险境和困难面前，都勇于担当，敢于挑战，将自己化成一柄“越王剑”，勇往直前，敢作敢为，富有极大的冒险和自我牺牲精神。

第三，理性务实，勇于创新。越文化胆剑精神还彰显了务实的作风和创新的意识，这些也很好地体现在了胡愈之身上。1925年1月，章锡琛和周建人在《妇女杂志》上策划了一个“新性道德专号”，引起商务编译所所长王云五的不满，遂撤了两人的职务。作为同事的胡愈之便和几位朋友商议，提出大家集资凑钱再办一个讨论妇女问题的刊物《新女性》，由章锡琛任实际主编，与商务保守派唱对台戏。考虑办期刊不能赚钱，难以长期坚持下去，胡愈之又和大家商量，倡议创办开明书店，并亲自参与书店的设计和筹办，成为开明书店的“参谋长”。可见，如果没有胡愈之的创新思维，也就不可能有开明书店的诞生。1932年5月，病愈后回到上海的胡愈之全力帮助邹韬奋编辑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生活》周刊，并为之写稿，但因为《生活》周刊坚持宣传抗日